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8

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周道濟博士

宋元民族思想研究

第

四

期

研究生：劉高陳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七月

論文提要

國父說：「余之謀中國革命，其所持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蹟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是以國父之三民主義，與我中國傳統固有思想之關係，既深且密。本所三民主義研究組同學，在任師卓宜領導下，擬就國父繼承我國固有思想部份，以畢業論文寫作方式，完成一部「中國三民主義思想史」。

本論文爲宋元民族思想之研究，其主旨在究明此時期民族思想之內容與特質，並以上接隋唐五代之民族思想，下連明清之民族思想，而成爲「中國三民主義思想史」之一部，承上啓下，其重要性至爲顯然。

本論文共分七章：第一章「諸論」，除對民族思想作一概括的敘述外，主要在說明此時期的歷史背景，及民族思想的特質。

第二章「民族自強方面」，論述此時期的民族思想，是內求統一與外求獨立，並以保障主權、光復故物及改革進取，以求國家和民族的富強爲目標。

第三章「民族戰爭方面」，指出一個民族在遭受異民族侵略與壓迫，又不能以外交和平方式求得解決時，爲求自己民族生存，必須實行民族戰爭。此時期，漢民族屢受外族侵迫，故民族戰爭爲民族思想最主要的表現。

第四章「民族氣節方面」，闡發此時期忠臣義士爲保衛民族生存，不惜犧牲其個人的生命，

表現出『威武不能屈』與『士可殺不可辱』的民族氣節。

第五章「民族文化方面」，研究宋代儒學之復興，與漢文化對於入侵異族的同化，及宋亡後漢文化對蒙古人在法令與典章制度上的影響，以顯示民族文化對於民族生存、發展與進步關係之重大。

第六章「民族文學方面」，是就當時的愛國詩詞與文學作品中，探究其民族思想。

第七章「結論」，總括宋元時期的民族思想，提出八點認識，以明本文之要旨。

在以上七章中，所涉及的代表人物，共二十六人，即宋太祖趙匡胤、太宗趙光義，與范仲淹、李觀、王安石、李綱、宗澤、張浚、韓世忠、岳飛、陳亮、葉適、劉錡、吳玠、余玠、李若水、唐重、文天祥、歐陽修、朱熹、趙復、許衡、蘇軾、陸游及劉因等。此二十六人，固非均為思想家，然由他們的思想、行動與事蹟，亦足以看出此時期民族思想的內容與特質了。

本論文在寫作期間，承蒙指導教授周師導濟，及所主任任師卓宜熱心指導，獲益良多，謹表示由衷的敬意與謝忱。又作者才疏學淺，缺失之處，在所難免，敬祈各位老師，不吝賜正。

劉高陳於政戰學校政治研究所

民國六十二年七月

宋元民族思想研究

第一章 緒論……………一

第一節 宋元時期的歷史背景……………三

第二節 宋元時期民族思想的特質……………一三

第二章 民族自強方面……………二三

第一節 民族自強與民族思想……………二三

第二節 民族自尊的維護……………二七

一、宋太祖與太宗的統一大業……………二七

二、元代的統治與漢人的反抗……………三二

第三節 維新圖強的三張……………三七

一、范仲淹倡言政治革新……………三七

二、李觀主張富國強兵……………四五

三、王安石實行變法圖強……………五〇

第四節 中興復國的運動……………五六

一、李綱、宗澤力圖光復祖業……………五六

二、張浚謀求收回失地……………六五

第三章 民族戰爭方面……………七七

第一節 民族戰爭與民族思想……………七七

第二節 韓世忠、岳飛主以戰勝夷……………七九

第三節 陳亮、葉適斥和議之非……………九〇

第四節 劉錡、吳玠、余玠的民族保衛戰……………九八

第四章 民族氣節方面……………一一三

第一節 民族氣節與民族思想……………一一三

第二節 李若水視死如歸……………一一五

第三節 劉~~錡~~不事二君……………一一八

第四節 唐重以死殉國……………一二一

第五節 文天祥正氣凜然……………一二六

第五章 民族文化方面……………一三五

第一節 民族文化與民族思想……………一三五

第二節 宋代儒學之復興……………一三九

第三節 士大夫之拒佛……………一四四

一、歐陽修的反佛論……………一四四

二、朱熹的斥佛說	一四九
第四節 元代漢文化之活動	一五三
一、趙復傳儒學於北方	一五七
二、許衡用漢法以致治	一六一
第六章 民族文學方面	一七四
第一節 民族文學與民族思想	一七四
第二節 忠君愛國的蘇軾	一七六
第三節 至死不忘中原的陸游	一八〇
第四節 不肯出仕元庭的劉因	一八六
第七章 結論	一九四
參考書目	二〇一

民族是人類的一種羣體，從人類而來。有人類就有民族。人類要求生存，民族亦要求生存。世界上從古至今，民族很多，有能生存者，亦有不能生存者；有生存得很好者，亦有生存得不好者；有爲壓迫他人之民族者，亦有被他民族壓迫之者；有爲文明民族者，亦有野蠻民族者；有爲歷史上古國而繼續發揚光大者，亦有被淘汰而成歷史上的陳蹟者。各民族都是人類，何以有此分別呢？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主要者，恐怕便是民族思想。可見民族思想，實爲民族求生存、發展與進步的關鍵所在。

國父說：『主義就是一種思想』（註一）。可見民族主義亦是一種民族思想。但思想不就是主義，要成爲主義，有種種條件。其中之一，是要有理想價值。所以民族主義是以民族爲理想。理想即目的。目的高於方法。因此，民族主義以「民族至上」爲格言。這就不僅要承認民族，而且要尊重民族。

民族一詞英文均爲 *Nation*，係由拉丁 *Natio* 一字而來。原指血緣相同的種族，後來慢慢從純血緣的種族，轉變而爲同文化的民族。國父論民族的成因，乃由於天然力造成，所謂血統、生活、語言、宗教與風俗習慣五種因素，即指血緣與文化兩方面而言的。可見民族與歷史文化是二而一的。沒有歷史文化，就沒有民族。所以民族主義要尊重歷史文化。

我們的祖先，已給我們創造了輝煌的成果，傳下幾千年累積而成的悠久歷史文化，陶鑄一

個廣土衆民，燦爛光華的民族。我們要自尊，但不能自大，要自愛，却不能自滿。必須認識過去，稱述民族祖先、英雄、烈士、光榮的事業、強盛的時代、偉大的貢獻、先輩的嘉言懿行等等，以光大祖先的遺業。同時也要努力現在，創造將來，保證我民族富強康樂的到來。

研究宋元民族思想，就是研究那個時代祖先對民族的貢獻，從他們的嘉言懿行中，來復興我們的民族，陶鑄我們的民族性。大詩人陸放翁一生盼望收復河山，到臨死的時候，賁願以歿。他辭世時的一首詩道：『到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註二）一個人到死的時候，明知萬事已空，還不能忘情北定中原，統一華夏，這是何等強烈的民族性。

民族性對於民族國家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歷史的事實證明，近代世界民族的發展，均趨向於民族國家的建立。這是民族求生存競爭的使然，爲民族性的作用。羅家倫先生說：『民族是國家的軀幹，民族性便是民族的靈魂！』『多民族的國家是不穩固的，無國家的民族是痛苦的』這就是說一個民族必須有其民族性，而且必須建立民族國家。

民族國家的運動，自十九世紀以來，可說是風起雲湧。如荷蘭與比利時，挪威與瑞典的分裂，縱係小國，也不能免其支配。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巴黎和會，在民族自決的口號之下，可謂集這個潮流之大成。這個主張的結果，是帝國的崩潰和民族國家的興起。這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事實愈爲明顯，至今已達最高峯。

國父的民族主義，就是主張建立民族國家。他說：『中國自秦漢而後，都是一個民族造成一個國家。』（註三）這就是民族國家。外國則不同，『外國有一個民族造成幾個國家的，有一個國家之內有幾個民族的。』（同上）他在『軍人精神教育』裏說：『第一之主義爲種族革命。謂排除他種民族，發揚自己民族，組織一完全獨立之民族國家也。』但『排除他種民族』，乃排除他種民族的壓迫侵略之意，不可作排外主義解。國父以爲排外主義是愚民之所行。所以他在『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之前途』講演裏說：『民族主義並非是遺着不同種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許那不同族的人來奪我民族的政權。因爲我漢人有政權纔是有國。』這可見民族國家的重要了。

本文研究宋元民族思想，其目的在恢復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靈魂，重鑄我們的民族性，以造成一個統一獨立的民族國家。以下除論述此時期的歷史背景與民族思想的特質以外，並分別就民族自強、民族戰爭、民族氣節、民族文化與民族文學等各方面，說明此時期所表現的民族思想。

第一節 宋元時期的歷史背景

任何一種思想的產生，都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宋元兩代，不僅其歷史背景不同，而且在中華民族發展的過程中，亦有其不同的歷史意義。宋代代表的是中國的傳統政權；元代不但不是中國的傳統政權，而且是中國第一次亡國於外來的蒙古人（註四）。錢穆先生說：『蒙古族入主中國，中國史開始第一次整個落於非傳統的統治。中國的政治社會，隨着有一個激劇的大變動。蒙古入主，對中國正如風雨之來臨。』（註五）此正說明宋元兩代歷史背景及其意義最主要的不同。

因此，研究此時期的民族思想，必先知道其各自的歷史背景，然後才能明瞭其民族思想的內容與特質。茲分別論述之。

一、宋代的歷史背景

(一)宋代的開國 宋代的開國，始於趙匡胤（九二七—九七六）之代周。自唐末大亂，淪爲五代，五十三年之間（九〇七—九六〇），擁立接踵，篡奪循環，而方鎮負隅割據，瓜剖豆分，是以兵燹流離，干戈遍地，人民鋒鏑餘生，厭亂而望治者已久。宋代就是在這樣一個分裂與墮落之後，重新建立起來的。

當周世宗去世以後，其子恭帝即位，年僅七歲。趙匡胤爲歸德軍節度使，位在指揮使之上，掌軍政凡六年。主少國疑，內部固有擁立之議。

據宋史紀事本末載：周顯德六年十一月，鎮定二州上言，北漢會契丹兵入寇，至是年正月辛丑朔，遣殿前都點檢檢校太尉歸德節度使趙匡胤率兵禦之，殿前副都點檢慕容延釗將前軍先發，時主少國疑，中外皆有推戴匡胤之意，都下謠言，將以出軍之日冊點檢爲天子，士民恐怖，爭爲逃匿計，惟內廷晏然不知。是夕次陳橋驛，將士相聚謀曰：主上幼弱，吾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冊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甲辰黎明，將士逼匡胤寢所，匡義普入帳中白之。匡胤時被酒臥，欠伸徐起，將校已露刃列庭，曰：諸將無主，願冊大尉爲皇帝。匡胤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衆即羅拜，呼萬歲，掖之上馬，還汴（註六）。於是趙匡胤就在士兵的擁立之下，正式即帝位，他是五代時由兵士擁立爲帝的第四人（註七）。他即位以後，改國號爲宋，是

爲宋太祖，並改元建隆。周恭帝則廢爲鄭王，居於房州（今湖北竹山縣）。這就是宋代開國的經過情形。

宋太祖爲人寬宏有度量，富於政治及軍事經驗，知人善任；其弟太宗亦聰明有才略，兩代相繼，由是削平羣雄，全國漸歸統一，遂奠立其三百多年（九六〇—一二七六）之基業。

（二）宋代的國策及其影響 宋代的國策，簡言之，即是「強幹弱枝」。它的基本原則有二：其一是全國之軍政財大權，完全集中於中央；其二是提倡文人政治，嚴禁武人干政。這「強幹弱枝」的國策，從太祖起，一直爲宋室所謹慎遵行，直至宋室滅亡而後已。宋太祖爲厲行其國策，乃極力整頓禁軍和削弱藩鎮。

在整頓禁軍方面，他首先排除禁軍中異己的重要將領李重進等，並撤銷「殿前都點檢」一類的要職，改以其弟匡義（後改名光義）爲殿前都虞候，統領禁軍。但當時他的故人石守信、王審琦、高懷德等人，都分典禁兵，在禁軍頗有勢力。宋太祖欲剝奪他們的兵權，乃與宰相趙普爲謀，此卽杯酒釋兵權之由來。

宋史紀事本末載：帝召普從容論天下事，……因晚朝，與石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臥也。」又謂：「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君臣之間，兩無猜疑

，上下相安，不必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註八）。

至此，禁軍中的可慮份子完全肅清。其後太祖更積極整飭禁軍軍紀，嚴懲其中不法份子，禁止組織義社。並大加簡校，淘汰冗弱；招集全國各地的精兵，以爲補充。此外更定禁兵分番戍守郡縣，以防士卒驕惰。禁軍經過此番改革，不僅對於歷代相傳功臣典兵之制自此而廢除，而且也不再是野心軍人倡亂的資本了。

在削弱藩鎮方面，有下列各種方法：其一、以文臣知州事。宋初藩鎮異姓王帶相印者不下數十人，乾德元年正月，太祖用趙普謀，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因遙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使知州事，自是節度使之權始輕。

其二、設諸州通判。乾德元年四月，初置諸州通判，統治軍民之政，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武臣漸失民政權。其三、置諸路轉運使。宋太祖知唐末五代重斂人民的弊端，將地方稅收，均由中央派官赴其地，分主其事。於是財賦之權盡歸中央。

此外，嚴禁諸州首長以私人典掌要職，每州並置通判，監督州政，遇舊有節度使出缺時，即以文人遞補。於是各項大權悉歸中央。尤以對禁軍整頓後，對藩鎮的管制更爲嚴密。

經過以上的改革，兵士雖立與藩鎮之禍，雖然得以革除，但惜其削藩鎮權太過，而武力漸衰，上重下輕，地方空虛，無權無方，以致本末俱弱，造成重文輕武的病象。

陳邦瞻曾論其事說：宋祖君臣，愍五季尾大之禍，盡節帥兵柄，然後征伐自天子出，可謂識時勢，善斷割，英主之雄略矣！然觀其任將如此，此豈猜忌不假人以柄者哉。後世子孫，不深惟此意，徒以杯酒釋兵權爲美談，至南渡後，奸臣猶託前議，罷三大帥兵，以與讎敵連和，豈太祖趙普之謀誤之邪。然當時務強主勢，矯枉過直，兵材盡聚京師，藩籬日削，故主勢強而國勢反弱矣。亦不可謂非其遺孽也（註九）。

張溥對此亦有評述：收兵之謀，發於趙普，普固文吏，利損將權，抑當藩鎮積強，華山桃林，窮而必變，其道莫易也。杯酒論心，大將解印，不賞而勸，術則何居，漢高殘賊，專戮功臣，光武反之，曲務保全，俾遠吏事，藝祖赤心既同肅王，石守信等復恃蕭曹故人之雅，不爲韓彭跋扈，時會適逢，投戈爲快，豈必盡說辭力哉。咸平年間，王禹偁言，江淮諸郡，毀城隍，銷兵甲，二十餘年，書生領州，蕩然無備。賈昌朝於仁宗朝言，將屢易，士不練，病在削方鎮太過。二臣去太祖世未遠，蒿目若此，豈開基聖主當日不爲子孫計乎。觀其文臣典州，老將禦邊，久任責成，戰守並用，萬年景福，何嘗去兵。末世處堂，祖功有咎，赫赫文武，寧爲東遷貶德哉。南渡，賊檜爲金人反間，納范同之策，召三大將入朝，盡收兵權，謬附前說，則又開門揖盜者矣（同上註）

從上面兩段話，可見「強幹弱枝」國策，對宋代歷史影響之大了。歸結的說，這個國策，以懲唐末五代以來之弊端，改弦易轍，乃定新方向樹新規模以爲治，針對實際環境，適應當時之需要，收拾殘破，與民更始，宇內悠然統一，此固不可謂無實效。然開國草創之初，綱紐未備，多

因事而行令，沿例以爲法，而乏高瞻遠矚，審察周詳，確立完美之大法，以爲長治久安計。故其策僅行之數十年，時移境遷，已露破綻，不困於財，則困於兵，內憂未已，外患浮臻，而姑息苟且，憚於改革，既無法以應變，遂深陷而不能自拔也。終至無法應付強鄰的侵擾，造成偏安與亡國的慘禍。

（三）宋代的內憂與外患 宋代的內憂是爲朋黨與姦臣。朋黨之禍，源於重文輕武與中央集權二者。自慶曆新政，反對者指范韓等革新儒士爲朋黨，聚訟盈庭，政治上隱然分爲兩派，彼此排斥與攻擊，熙寧變法，朋黨之爭益形劇烈，新舊黨互相排擠，勢成水火。然此僅限於對事，據理爭論，而未有涉於私憾者，然自元祐更化後，舊黨中的朔派份子，憑宣仁太后的權力，更以誅鋤新黨爲事；誅鋤之不足，復出於深文陷害，竄蔡確於嶺南，首開惡例，黨派之爭，一變而臨於生死之際。自是人才與政事分爲兩途。蓋政事爲一，而人才則有國家之才，朋黨之才和派系之才。黨爭爲派系之才，而擁迫即爲派系之才了。因此，人才囿於派系，是此即非彼，向左即背右，鑿柄難容，涇渭分明。於是蔡京乘虛竊政，獨擅權柄，假新法爲名，盡量排斥舊黨，以遂其私，就是在新黨之中，對於異己者亦加以排斥。黨禍歷三十多年，人才忠良之士，消磨殆盡。國家元氣因此大傷。更因派系所造成之群小，充斥朝廷，一俟金人入寇，便徬徨失策，終於釀成靖康之禍。可是 宋人積習難除，黨爭之風未泯，山河半壁，劣性猶存。且以在國家多難之秋，仍不能團結以禦敵，黨禍之害，於此可見。

姦臣擅權，始於蔡京，而後黃潛善、汪伯彥、秦檜、韓侂胄，以至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註十）之輩，擅權而不易去者，皆由此也。宋代之亡，原因雖多，然姦臣擅權，實爲主因。且朋黨與姦臣，互爲表裏。是以政治之紛亂，起於朋黨之內訌，正邪糅雜，無所適從。以君子軋君子，徒授小人以隙，兩敗俱傷，使兇人得志，故曾布韓忠彥之爭而有蔡京，張浚趙鼎不協而有秦檜。朋黨之明爭暗鬥，姦相權臣遂醞釀而出焉（註一一）。

宋代的外患：宋代三百多年之間，從未強盛過。它受着若干外族的侵害，如契丹、西夏、女真、蒙古等，都是很兇悍的民族。它們一旦牧馬南下，揚戈直迫大梁，四戰之地，無險可守，根基立即動搖，此爲建都形勢之不足故也。

張方平曾謂：『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地。非如函秦洛宅，形勢足恃。自唐末朱溫受封於梁國而建都，至於石晉割幽薊（今河北省）之地以入契丹，遂與強敵共平原之地。故五代爭奪，其患由于幾句無藩籬之限，本根無所庇也。祖宗受命，規模必講，不還周漢之舊而梁氏是因，豈樂而處之，勢有所不獲已者。大體利漕運而瞻師旅，依重師而爲國也，則是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爲命，食以漕運爲本，漕運河渠爲主。』（註一二）太祖末年欲卜都洛陽曰：終當居長安，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而晉王（即太宗）力請還汴，太祖終不以爲然，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范仲淹又力主於洛陽廣儲蓄，繕宮室，爲遷都計，而呂夷簡目爲迂濶。其先則畏難因循，其後又偷安苟且，一誤再誤，而宋